

「离骚」创作时间再辨析*

谢君**

- 차례 -

1. 绪论
2. 汉代学者与朱熹的观点及其文献依据
3. 「离骚」作时纷争的原因分析
4. 屈原作「离骚」于疏而未放之时
5. 结论

〔中國語要旨〕

汉人及朱熹等人对「离骚」创作时间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也是我们应该尊重的,「离骚」就是“王怒而疏屈平”后所作. 具体而言,「离骚」应作于怀王十六年(前313)至怀王十八年(前311)之间,当时屈原被疏但仍在郢都. 关于「离骚」作时的不同观点源于对文献记载的误解与对文本的误读.

* 本文属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成果,项目编号:“校20190116”.

** 作者信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 xiejun291@126.com

关键词:「离骚」,创作时间,屈原,楚辞,『史记』,怀王,朱熹

1. 绪论

「离骚」到底作于何时,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屈原于怀王朝所作,还是在顷襄世所为,是屈原早期,中期还是晚期作品,观点层出不穷.其实关于屈原最重要的作品——「离骚」的创作时间,是有较为明确的文献记载的,之所以还会产生如此多的纷争,是因为后人对文献的解读与文本的理解产生了偏误所至.自汉代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以至宋代朱熹等人关于「离骚」作时的观点是应该得到尊重与正确理解的.

2. 汉代学者与朱熹的观点及其文献依据

关于「离骚」的作时自汉至宋,基本有着一致的观点,或者说还没有出现太多的纷争.如班固的「离骚赞序」云: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¹⁾

王逸『楚辞章句』亦曰:

1) (汉)班固,『离骚赞序』,见(宋)洪兴祖著,『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1面.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²⁾

朱熹在「离骚经序」中又借用王逸的说法云:

「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谮毁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谗,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³⁾

可知,从汉代学者班固,王逸到宋人朱熹,均认为「离骚」应作于怀王疏屈原之后,即是“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谮毁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谗,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这可以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及刘向所编「新序·节士」中找到文献依据.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

2) (宋)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面.

3) (宋)朱熹著,李庆甲校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面.

“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去秦，厚弊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

……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原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⁴⁾

「新序·节士」记载道：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张仪因使楚绝齐，许谢地六百里。怀王信左右之奸谋，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楚既绝齐，而秦欺以六里，怀王大怒，举兵伐秦，大战者数。秦兵大败楚师，斩首数万级。秦使人愿以汉中地谢，怀王不听，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曰：“以一仪而易汉中地，何爱，仪请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属共言之，王归之。是时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于此，于是复用屈原。屈原使齐还，闻张仪去，大为王言张仪之罪，怀王使人追之，不及。后秦嫁女于楚，与怀王欢，为蓝田之会。屈原以为秦不可信，愿勿会，群臣皆以为可会，怀王遂会。果见囚拘，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⁵⁾

班固，王逸的观点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史记』『新序』的记载。细读以上文献，却又可发现细微不同。班固，王逸及朱熹等人都认为「离骚」作

4) (汉)司马迁 著，(宋)裴骈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482-2485面。

5) (汉)刘向 编著，石光瑛 校释，陈新 整理，『新序校释』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936-949面。

于屈原被谗，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但都没指明屈原是因何事被谗而见疏。史迁却具体指出是上官大夫谗屈原造宪令居功自傲而被怀王疏远之后，屈原作了「离骚」。但『新序』的记载，并没有提及屈原被疏以及写作「离骚」是因造宪令而受谗，而是说张仪使坏，楚群小共谗屈原，以致屈原被放逐，这才写了「离骚」。『史记』和『新序』关于「离骚」创作时间和原因的记载均略有出入，一是说张仪初次来楚之前，一是说张仪初次来楚之后；一说是屈原被疏之后，一说却是屈原被放之后。王逸所说的“王乃疏屈原”，与『史记』所载相同，而与『新序』所说的“遂放于外”有出入，但洪兴祖注王逸“王乃疏屈原”时曰：“疏一作‘逐’”，则又与「新序·节士」所载无别了。从王逸，朱熹提到上官大夫和靳尚两人谗害屈原，与『新序』所载一致，而『史记』只提及上官大夫来看，王，朱的资料来源与『新序』更紧密。而班固云上官大夫因妒害屈原之宠而谗之于王，以致王怒而疏屈原，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资料来源与『史记』更密切一些。尽管如此，『史记』『新序』两书关于屈原创作「离骚」的记载其实并无多大差别，所指的时间也相差不远，都是在张仪来楚前后，且都在张仪正式以商於之地六百里骗怀王绝齐之前。而屈原之被疏与放于外，应也指的是同一回事。只是由于两书记载的详略，对史料的处理以及表达时的措辞不同而造成了一定的出入而已。

综合『史记』『新序』的记载来看，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张仪相楚后，楚国当权派渐渐转向亲秦；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与当权派政策相左，因此受排挤而被怀王疏远。屈原因之作「离骚」，创作时间应该在张仪来楚行离间计之后，至于是否是在怀王知道上当受骗后再次重用屈原之前，即屈原使齐还，谏怀王杀张仪之前，那却未必。『史记』『新序』二书以及班固，王逸，朱熹等人所说的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乃作「离骚」，只是说明了屈原写作「离骚」的最初起因，并不是说怀王疏屈原之初，「离骚」既已成篇。这是需要我们仔细分辨的。因为自怀王怒而疏屈原

后，屈原政治仕途上最得意的时期就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屈原后来依然可以使于齐，依然可以谏怀王杀张仪，但与任为左徒，造为宪令时期相比始终是失意状态，始终处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落寞心境，即始终处于创作「离骚」的心理状态。且屈原在怀王朝被疏远不止一次，应是在遭受多次打击后才开始写作「离骚」。

但「离骚」一定是成篇于怀王入秦之前，这是从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屈原一生最主要的政治活动都在怀王朝，怀王对屈原有知遇之恩，屈原对怀王的感情远胜于对顷襄王的感情。从“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等句看，「离骚」一诗显然是向怀王述说的，且说在怀王入秦不返之前。史迁曰：“屈原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这里所说的“一篇”即指「离骚」。屈原作「离骚」，仍然冀幸君之一悟，可知，「离骚」必作于怀王仍可以改过之时，即入秦不返之前。

3. 「离骚」作时纷争的原因分析

按理说有史册的明文记载和「离骚」的内证，「离骚」的大致创作时间应该已不成问题，为何还是争论纷纷呢？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史记』

6) 关于「离骚」作时，陈学文(『离骚』创作时地新探，『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12-19面)总结出了10种观点：(1)作于楚怀王十四年(今人李延陵说)。(2)黄震云认为“「离骚」是因疏而作，写作地点是郢郊，写作时间是待郢三年未能招回之时。……「离骚」写作的确切时间应在怀王十五年左右，即公元前314年前后。”(3)屈原于怀王十六年作「离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明确提出此说。司马迁，刘向大概也认为「离骚」作于怀王十六年前后。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考』也持此说。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离骚」是屈原被谗见疏引退于汉北所作，朱熹认为是初被疏远后在郢都所作，他们所说地点不同，但时间比较接近。近人徐仁甫『楚辞别解』认为“「离骚」作于屈原初被疏远之时，『史记』本传说甚明确。”林庚亦赞同此说。当代学者吕培成认为，“「离骚」当作于作者遭谗见疏之际，而非放逐之后，其时宜在怀王十六

的记载,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使得司马迁关于「离骚」创作时间的记载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二,从内容考察,「离骚」的创作时间与史册所载似乎未能一一对应。由于这两点,『史记』『新序』以及班固,王逸,朱熹等人一致的观点并未能成为「离骚」作时的定讞。很多研究者完全抛开『史记』与『新序』的明确记载和班,王,朱等人的一致观点,而从事于从「离骚」内容中找模棱两可的内证或者从楚国历史来凭空揣测的工作,以至于「离骚」到底是作于怀王时期还是顷襄王时期,或者还是从怀王时期持续到襄王时期,是屈原被疏后所作还是被放后所为,至今得不出一致的答案。

其实这两点障碍都好解决。第一点,关于『史记』记载的矛盾问题,无非指两个方面:一是「屈原列传」前面提到上官大夫进谗,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作「离骚」;后面又说:“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两者不仅在时间上有别,而且前者是说被疏,后者则言放流,矛盾也。二是指「屈原列传」载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作「离骚」;而

年一一十八年。”(4)「离骚」作于怀王十九年至二十四年(浦江清『祖国十二诗人·屈原』)。(5)屈原于怀王二十四年开始写作「离骚」(逯钦立「屈原「离骚」简论」);屈原于怀王二十四至二十六七左右于郢都作「离骚」,时未被放(如胡念贻,金开诚等);或可能与怀王二十五年谏阻黄棘之会有关,时已被放,作于汉北(如孙作云,戴志钧等)。赵逵夫认为「离骚」“只能作于怀王二十四,五年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具体说来,作于怀王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之间。”(6)作于怀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之间(马茂元说)。刘永济认为「离骚」作于怀王二十八年至顷襄王元年(见『屈赋通笺』)。龚景瀚『离骚笺』认为其作于怀王不返,顷襄未立之时。或认为屈原在怀王末年被放至顷襄王初年作「离骚」(如马春香,余丹青认为其作于怀王三十年至顷襄王三年之间)。(7)始作于怀王十六年见疏以后,成于怀王入秦顷襄王嗣立初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8)颜新宇认为「离骚」可能作于顷襄王前期,怀王死于秦后,屈原流放江南之前,约在顷襄王三年至十二年之间,而以靠前的可能性比较大。(9)作于顷襄王三年或三年之后,是屈原被放江南后的作品(游国恩『楚辞概论』之说)。潘啸龙等则认为屈原于怀王三十年因谏阻武关之会被初放,后大约于顷襄王顷襄王四年再放,约于八,九年作「离骚」,不过他认为「离骚」是作于汉北。(10)认为是屈原晚年作品,作于「怀沙」之前(郭沫若『屈原研究』),甚至认为是屈原的绝命辞(如江立中)。蒋天枢则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三十年或稍后(见其『楚辞新注』导论)。

「史记·太史公自序」⁷⁾中却说:“屈原放逐,著「离骚」”,一言疏,一言放逐,矛盾也。

关于第一个矛盾,即「屈原列传」中的自相矛盾,研究者已有不同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认为“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说的不是「离骚」。如林庚先生就认为『史记』所说“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指的是「哀郢」⁸⁾,褚斌杰先生认为指的应是「招魂」⁹⁾。这样,“虽放流”后的一段文字就与「离骚」无涉,「离骚」创作时间乃是怀王怒而疏屈原之后。

第二种是认为「屈原传」文字有错简。顾炎武,梁玉绳,刘永济,姜亮夫等人均认为此篇有错简。在此,我们以姜亮夫先生的观点为例来论证。姜先生认为:

以文言理,“王怒而疏屈平”一语,当下承“屈平既绌”一段,而屈平疾王听不聪一段,实与下文“其存君兴国,而欲返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一节脉络相属。自来解者多不明此,遂多惶惑之论矣。又按,依事理,文脉两端定之,“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以下五句,及“离骚者犹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情词急激,其思理必不仅惜其见疏。怀王客死于秦,楚人皆怨子兰之劝王;国君死于囚徒,远在敌营,是何等伤心事,何等大事。则史公激于此等事象,因而引入作「骚」一段。事理既明,奋笔为之,以「离骚」一文为主干,以总论屈子忠贞之操,文兼『风』『雅』,畅发其情,且以寄己之忿懣,理顺词达,则此一段文字,当为错简,应移在“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之后,“屈原既嫉之”之前,则文理事迹,两皆顺适矣。……然照以「离骚」全文,似无怀王入秦

7)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见「汉书·司马迁传」)。

8) 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屈原生卒年考」,见林庚著,『林庚楚辞研究两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28面。

9) 褚斌杰著,『楚辞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9面。

不返之义可说, 则「骚」之成篇, 当在怀王之秦以前无疑. 史公不过始终其义而立言, 固不必论其创作时日, 得在义理, 而不重在文理也.¹⁰⁾

经姜亮夫先生这么一调整, 「屈原列传」的前后矛盾就解决了. 虽然把“离骚者犹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移入“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之后, “屈原既嫉之”之前, 但姜先生认为从文本看, 「离骚」当成篇于怀王入秦之前. 太史公之所以将评「骚」的一大段放在怀王入秦不返之后, 是出于情感上和表达义理的需要.

第三种是认为「屈原传」有后人窜改的地方. 这以汤炳正先生的研究最为详尽. 汤先生认为, “离骚者, 犹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矣”一段, 以及“虽放流”至“岂足福哉”一段皆后人将刘安「离骚传叙」文字窜入了「屈原列传」之中¹¹⁾. 这样一来, 「屈原列传」中的矛盾就解决了, 「离骚」乃是作于怀王怒而疏屈原之后.

以上三种方案, 不管合理与否, 至少都可以解决「屈原列传」中记载的矛盾问题. 我们认为, “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指的就是「离骚」; 「屈原传」也并不存在错简和被窜改的问题, 不烦改正; 疏, 绌, 放流, 逐于外, 放逐, 迁等都相差不大, 均与流放刑罚无涉, 疏, 绌均指被疏远, 不被器重, 而放流, 逐于外, 放逐, 迁等均是指放官外任而已. 现详论如下:

我们之所以认为“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指的就是「离骚」, 是因为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离骚」, 也只有「离骚」才能充分体现出屈原的意志和情感. 『史记』所云: “屈原既嫉之, 虽放流, 睠顾楚国, 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 一篇之中, 三致志焉.” 未提篇名, 显然是承前面提到的「离骚」而来, 属于承前

省略. 如果是其他作品, 第一次提及, 必然会具名. 所以, 认为“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指的不是「离骚」而是屈原其他作品的观点是不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分两处论述, 且前者于怀王怒而疏屈平后, 后者在顷襄王即位之后? 其实“屈原既嫉之”以下一段, 显然只是在怀王客死于秦后, 对其不听屈原忠告的结果的一个总结与评价, 这是『史记』写作的惯例. 为了总结和评价怀王, 史迁在此又追叙了一下屈原对怀王的劝谏. “虽放流, 睠顾楚国, 系心怀王, 不忘欲反, 冀幸君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是对屈原被怀王疏远后的处境与心态的追叙.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 一篇之中, 三致志焉. 然终无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 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是对屈原通过写作「离骚」讽谏怀王的追叙. 但是, “怀王终不悟”屈原在「离骚」中的反复“致志”, 所以才导致被骗入秦, 且最终客死于秦. 至于为什么不把这段放在前文“竟死于秦而归葬”之后而插在此处, 那是因为“屈原既嫉之”提及到了屈原, 以下刚好连带而出, 对屈原讽谏怀王而怀王不悟以致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作一个总结.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是上接“屈原既嫉之”而来的, 所闻非指「离骚」, 而是指屈原嫉他劝怀王入秦致使怀王客死的某些态度和言语. 所以“屈原既嫉之”以下一段不是错简也不是后人窜入的, 司马迁原文就是如此的.

关于屈原的流放问题, 业师方铭先生通过详细考察先秦典籍及『史记』中所用之“流放”概念, 认为流放作为一种刑罚, 虽然见于先秦, 但是使用并不普遍, 特别是春秋, 战国之际, 所使用几乎不见. 『史记』不载战国时期作为刑罚意义的流放事件, 司马迁所用之流放概念也不限定在刑罚意义上的放流. 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放流, 不一定需要理解为一种刑罚¹²⁾. 因此, 『史记』『新序』中有关屈原被疏, 被绌, 被放流, 被放逐等表述, 其实并没有根本区别, 只是程度上有不同而已, 均是指不被器重

10) 姜亮夫, 「史记屈原列传疏证」, 见姜亮夫 著, 『楚辞学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 16-17面.

11) 汤炳正 著, 『屈赋新探』,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0年, 3-8面.

12) 方铭 著, 『战国文学史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年, 392-399面.

或被外放。“顷襄王怒而迁之”之“迁”也未必就是指流放，应该也是指贬谪外放。所以无论是怀王朝还是襄王朝，屈原都没受过流放之刑。认为史册记载存在屈原被疏与被放矛盾的研究者其实根本就是对史册的误解，没有弄清楚，放其实是一个意思。

至于第二个矛盾，即「屈原列传」载怀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作「离骚」；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却说：“屈原放逐，著「离骚」”的矛盾，就更好解决了。『太史公自序』中的表述明显是概述性质，并且此处「离骚」是代指屈原所有作品。太史公所说那段名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居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¹³⁾所举例证均是概述而已，并非准确的记载史实，其重点是说人因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发愤作书。这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过，在这就不多说了。

文献记载的矛盾问题解决后，还有另一个障碍，即从内容看，「离骚」的创作时间与史册所载似乎不尽相符。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离骚」中屈原提到“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似乎表明年纪不小了，如果按『史记』所载，是张仪来楚后怀王疏屈原时所作，那时屈原年岁还小，与「离骚」中的这些诗句似乎不符。其次，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灵修之数化”一般解释为君王的多次变化，既然是多次变化，那么屈原一定是经历了多次政治上的起伏。而「屈原列传」所载屈原作「离骚」时似乎是初次被疏，「屈原列传」所载与「离骚」内容似乎存在矛盾。第三，「离骚」中，屈原提到“余既不

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似乎只有被放逐，才会有离别和返回。并且「离骚」中还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等诗句，似乎是放逐于外才可能有的场景。这些与「屈原列传」所说的「离骚」是怀王初次疏屈原后所作都似乎不尽相符。第四，「离骚」中的“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莫足与之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句似乎与「怀沙」中的“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以及「惜往日」中的“不毕辞而赴渊”一样都是绝命辞之类，如果是初次被疏，不可能有这样的表述。

以上这些都只是涉及对作品的理解问题，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解读，所以并不能成为十足的证据。针对以上四种困惑，也都有学者作出过合理的解释。我们在此只作简要的回应。屈原在「离骚」中提到的“老”并不能说明他自己就真的老了，只是一种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心理的体现而已。至于“伤灵修之数化”，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王怒而疏屈平”只是屈原作「离骚」的最初起因，并非指「离骚」完成于此时。屈原“忧愁幽思”是“王怒疏屈平”后的长期心态。屈原是在“王怒而疏屈平”后又经历过多次起伏才创作了「离骚」，当然可以说“伤灵修之数化”。退一步讲，即便说屈原于“王怒而疏”后立马创作了「离骚」，“数化”也是解释得通的。因为『史记』记事不可能巨细无遗，我们并不能肯定怀王怒而疏屈原之前就没有类似事件的发生。第三，第四点更是不足一驳。先不说在太史公笔下，“疏”与“放”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即便确如部分研究者所理解的那样，一指疏远，一指流放之刑，也完全不妨碍我们的认识。谁说被疏就不能“离别”和返回了呢，谁说被疏就不能在外游历了呢？非得是放逐在外才行？何况「离骚」的离别与游历都是计划或想象，并非是已付诸实践的行为。至于将“从彭咸”说成是绝命辞之类，则完全是误读。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彭咸”与屈原自沉水死无关。

13) (汉)司马迁 著，(宋)裴骃 集解，(唐)司马贞 索隐，(唐)张守节 正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3300面。

4. 屈原作「离骚」于疏而未放之时

破除了这些障碍后,我们再回到『史记』『新序』的记载以及班固,王逸等人的观点,对汉人关于「离骚」创作时间的基本统一的共识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无谓的质疑了.我们认为,汉人及朱熹等人对「离骚」创作时间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也是我们应该尊重的,「离骚」就是“王怒而疏屈平”后所作.

从内容来看,「离骚」应该是屈原被疏后,但仍未离开郢都时所作.首先,篇名为“离骚”,无论是主流观点所理解的“离别的忧愁”,还是我们所认为的“离别之歌”,都是表示这是为离别而作.诗人要离开的地方即郢都,说明此时诗人还在郢都.其次,从篇中表述可知,诗人还未曾离开郢都.篇中有曰:“忽反顾以游日兮,将往观乎四荒.”,“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明显是一种打算离开,却还没离开时的语气.诗人此时还在郢都,由于受到不公正待遇,愁苦悲愤,想离开故都远逝他方,但又不忍离去,充满矛盾与痛苦.第三,从篇中的表述可以看出,诗人所诉说的对象是怀王.“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等语说的是君王以前本与自己有约定,后来却变了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人希望君王能醒悟,识破佞臣之谗言,重新信任自己.诗人反复“求女”的目的就是为了能通君侧,让君王回心转意.这些话只能是针对怀王而言,因为只有怀王才与屈原有过“初既与余成言”的过去,只有怀王曾重用过屈原,后来又听信谗言而疏远屈原.顷襄王根本没给屈原机会,一即位就迁屈原于江南.怀王对屈原有过知遇之恩,屈原对怀王有感激之情,并心存重新被信任和重用的希望,所以屈原舍不得离开国君与故都,高唱离歌而犹豫不决.这些都表

明,「离骚」只能是作于怀王朝,且是未离开郢都前.将「离骚」认作顷襄王朝的作品,甚至认为是屈原绝笔的观点都是不对的.姜亮夫先生将『屈原传列』作错简处理是不合理的,但他认为“照以「离骚」全文,似无怀王入秦不返之义可说,则「骚」之成篇,当在怀王之秦以前无疑”¹⁴⁾,对「离骚」成篇的大致时段的把握却还是准确的.认为「离骚」是怀王放屈原于汉北或者江南时所作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离骚」是屈原未离开郢都时所作.

以屈原在怀王朝被疏而未离开郢都的时间来推算,「离骚」应该作于怀王十六年(前313)至怀王十八年(前311)之间,因为在这之后,屈原就被外放江南,直到怀王二十八年(前301)后才被召回.

5. 结论

综上,关于「离骚」创作时间,刘向,司马迁,班固,王逸,朱熹等人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均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这是我们讨论「离骚」创作时间的前提.后人的纷争源于对文献的误解与对文本的误读.结合文献,文本及屈原生平经历,我们可以推断,「离骚」的创作时间为怀王十六年到怀王十八年之间,即公元前313年至公元前311年间.

¹⁴⁾ 姜亮夫,「史记屈原列传疏证」,见姜亮夫著,『楚辞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7面.

[ABSTRACT]

On The Creation Time of Li Sao

Xie, Jun(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Han scholars and Zhu Xi and others have basically the same view on the creation time of Li Sao, which we should respect, Li Sao was created after "Wang was angry and alienated Qu Ping". Specifically, Li Sao should have been written between the 16th year of King Huai (313 BC) and the 18th year of King Huai (311 BC), when Qu Yuan was evacuated but still in Ying.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reation time of Li Sao originated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documentation and the misreading of the text.

Keyword : Li Sao, Creation time, Qu Yuan, Chu Ci, Shi Ji, King Huai, Zhu Xi

[한국어 초록]

漢族 사람들과 朱熹 등의 「離騷」 창작 시기에 대한 인식은 기본적으로 일치한다. 이것은 우리가 눈여겨 봐야할 지점이다. 「離騷」는 “왕이 노해서 屈平과 소원해진 후”에 창작된 것이다. 구체적으로 말하면 「離騷」가 懷王16년(기원전 313년)부터 懷王18년(기원전 311년) 사이에 창작된 것은 마땅하고 그 당시 汨원은 회황과의 사이는 소원했지만 汨원은 아직 郢都에 있었다. 「離騷」의 창작 시기에 대한 일치하지 않는 관점들은 문헌 자료에 대한 오해와 텍스트 오독에서 비롯된다.

주제어 : 離騷, 창작 시간, 屈原, 楚辭, 史記, 懷王, 朱熹

[参考文献]

□ 基本资料

(汉) 班固 著, 「离骚赞序」, 见(宋) 洪兴祖 著, 『楚辞补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宋) 洪兴祖 著, 白化文等 点校, 『楚辞补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汉) 刘向 编著, 石光瑛 校释, 陈新 整理, 『新序校释』卷七,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汉) 司马迁 著, (宋) 裴骃 集解, (唐) 司马贞 索隐, (唐) 张守节 正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宋) 朱熹 著, 李庆甲 校点, 『楚辞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单行本

褚斌杰 著, 『楚辞要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方铭 著, 『战国文学史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姜亮夫, 「史记屈原列传疏证」, 见姜亮夫 著, 『楚辞学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林庚 著, 『林庚楚辞研究两种』,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汤炳正 著, 『屈赋新探』,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0.

谢君 著, 『朱熹楚辞学研究』, 香港: 中国古文献出版社, 2014.

□ 论文

陈学文, 「『离骚』创作时地新探」,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8.01, 12-19面.